

遵義文史資料



遵 义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十 八 輯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八月

编 审：罗文鼎 夏仁斌

主 编：谢以蓉

封面设计：陈 秀

封面题字：傅 浩

遵义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第二十八辑

主 办：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出版：《遵义文史资料》编辑部

准印证号：黔刊资字第 H(96)2-07(14) 号

发行范围：各地政协、近现代史研究单位

工本费：3.20 元

目 录

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的遵义革命活动·····	陈福桐 肖先治	(1)
忆十六军兼遵义军分区时的《勇士报》·····	孙文波	(17)
大娄山上的苗民自卫队·····	熊天贵	(20)
军大岁月萦怀·····	饶世文	(41)
忆十六军教导二团学员在遵的一段生活·····	李春银	(46)
回忆庙坝战斗·····	俞庆铨	(56)
忆抗日烈士郝梦龄将军在遵轶事·····	施德久	(61)
血战松山——恢复滇缅国际通道·····	张德崇	(64)
“八一三”淞沪抗战回忆·····	刘正材	(70)
回顾抗日时期的反攻宜昌战役·····	周振富	(72)
回忆禹门渡的一场激战·····	陈绍培	(75)
回忆殒山的一次战斗·····	柏新民	(77)
回忆抗战中两件难忘的事·····	余维华	(79)
回忆慰劳抗日战士·····	杨权光	(82)
埋藏在我记忆中的周西成琐事·····	冯开津	(84)
刘芷庄先生事略·····	陈跃寰	(99)
记陈沂同志·····	张贵淮	(107)
回忆魏宇平老师二三事·····	刘慎先	(112)
徐瑞和在遵义·····	张炎整理	(116)

忆张肇奎先生传奇趣闻·····	冯开津 (118)
我记忆中的江仲瑞先生·····	余大才 (131)
邱琼云教授在遵事略·····	张淑莘整理 (136)
我们的邱弘行总工程师·····	张淑莘整理 (138)
记解放初期的一等治安模范周玉华·····	李春银 (143)
我的母亲韩淑敏·····	庞国玉 (146)
鲤鱼田、蜈蚣桥和梭油孔·····	陈 灿 (154)
历史悠久的梧桐街·····	杨权光 (157)
清代遵义反洋教运动琐况·····	关 山 (160)
没有忘却的点点滴滴·····	曾仲康 (169)
周家乾与《黔声日报》的关系·····	翁仲康 (181)
遵义行署机关幼儿园概况·····	李廷久 (188)
土地管理十年回顾·····	王邦作 (193)

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的 遵义革命活动

陈福桐 肖先治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党领导全国人民击败了顽固而强大的敌人，创建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顾遵义人民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十五年间革命的、进步的斗争活动，必将勉励后人更加奋发，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红军长征到遵义和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从辛亥革命以来至一九三四年前的贵州，长期是军阀混战的局面。先是兴义系军阀统治贵州长达十四年，继后是桐梓系军阀接踵盘踞，周西成统治的三年，勉强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周西成死后，桐梓系军阀为争夺地盘和权位，发生内讧，连年不断的拉锯战争，使广大人民包括一些民族工商业者都遭受祸害。军阀战争必然要增加军费开支，他们开

源的办法是允许广种鸦片，借此多征税款。种烟流毒之深，亦正如林则徐禁烟奏摺中所指出的危险，“不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贵州“双枪兵”，既有步枪，又有烟枪，即可概见当时烟害情形。军阀掠夺人财产也是花样百出，在三十年代初，军阀争夺遵义城的围城战争中，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三师”贴出了一张遗臭万年的布告：“野战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放火。军民人等，一齐努力！”。那班军阀、文痞、流氓为了玩弄讹诈，就这样自绘一副杀人放火的凶相，吓得全城人民深恐一把火烧掉了数万人身家性命所寄托的乡里，赶忙凑足一大笔银元，请这帮人弃城出走。仅从这张布告，也可依稀想见当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景况。当时遵义有一所贵州省立第三中学和一所县立的女子中学，一些具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生，面对着这样战乱和贫困的现实，在革命浪潮影响下，由不满社会进而希望变革社会，有的则希望“好人政治”，过几天安居乐业的生活。当时留学上海、北平的学生和一些革命工作者，寄来一些“五四”时代的文艺书刊和一些革命理论读物，也回来几个进步教师，宣传真理，启发了遵义部分进步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开扩了眼界，激动鼓舞，跃跃欲冲破藩篱而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青年学生中有了读书会组织，有从川东来的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组织起“红军之友协会”。准备迎接红军。红军入遵义城后，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指示把这个组织更名为“红军之友社”，由它发动和组织群众，列队至南郊迎接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入城。在群众热情高涨时刻，召开了万人大会，成立起遵义县革命委

员会和一些工农革命组织，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一九三四年元月，毕节地下党第一个支部成立，一九三五月元月，林青在遵义向党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中央局组织部兼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罗迈（李维汉）代表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从此，贵州的革命活动有了省工委的领导。红军转战贵州时期，地下党得到锻炼，红军离开贵州以后，地下党就继续按照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针，在艰难的斗争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在遵义会议精神启示下展开的革命斗争

红军《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中说“我们已到了以遵义为中心赤化黔北，创造黔北新苏区根据地，就要夺取遵义附近城市与城镇了。为了保证正确执行苏维埃的各种法令，特别是城市政策以及给群众以更好的影响，保证在赤化开始更好地发动群众与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扩大苏维埃的影响，以便顺利创造这一地区的新苏区，便要求我们红军能够遵守严格的纪律，毫无违反苏维埃法令的行为以及庄严的军容”。红军为此提出一些必要的规定，以保证上述要求充分执行。红军决定设遵义警备司令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这是党中央对遵义在长征时期重要地位的高度重视。红军入城后的遵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贵州军阀部队在红军强渡乌江向遵义城急行军的紧急关头，抢劫商品，仓皇逃跑，中心地区的商店只得暂时停业。

红军入城后，立即号召各商家整理货柜，继续开业；同时设立苏维埃银行，宣传公买公卖政策；商界代表还接受红军委托，帮助购买军用品和布匹，党和红军的文化工作者团聚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文艺活动；保护私家藏书，尊重地方群众所推崇的一些老知识分子，要他们参与筹备建立一个图书馆。建立革命政权后，工农积极投入活动，号召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

红军离开时，从红军九军团调来红军指战员王友发等组织一支有一百多人参加的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在三县边界地区与国民党地方团队作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地主武装，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革命的威力给人民带来的好处。虽然这支队伍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遭受挫折，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他游击队员却转入地下长期活动。贵州省工委根据遵义的具体情况，决定派杨天源回遵义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带领游击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党的秘密组织为了学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培养进步力量，在遵义东乡李家坝成立“反帝拥苏同盟”。李家坝是遵湄绥游击活动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工作起来方便。他们发起大家出钱在城里开办“黔北书店”，向群众出售革命理论和革命文艺书刊，传播革命消息，激励遵义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提高革命认识，参加革命行列。

毛泽东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因为长征在遵义播下了革命火种，遵义革命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敢于坚持革命宣传，进行革命活动。参加党和党的外围群众组织的青年日益增多，党以农村和城镇的学校为阵地，用办壁报，演

剧、唱歌和组织读书会等活动，培养了干部，教育了群众。从一九三八年起，先后输送到延安去的党员和群众就有三十六人之多，这充分说明红军长征到遵义，党召开遵义会议后给人民影响之大，教育之深。

国民党以薛岳、吴奇伟部队和川军部队数十万之众，包围红军。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胜利越过了大渡河。国民党又在遵义实施严密的管制，从城镇到农村都采取高压的手段，企图彻底消灭红军的影响。首先，国民党在遵义强化了它的专政机器：一、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在遵义经常驻扎一个师甚至一个军，控制黔北地区，防止暴动和防止红军反攻；二、遵义县设第五区（黔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第一任的专员和保安司令就是部队转来的一个师长，同时，蒋介石在江西搞特务活动的AB团用别动队番号一个中队驻在遵义，配合专员公署搞城乡壮丁训练，在中学搞军事训练，还集中小学教师办训练班，还以推行“新生活运动”为借口，对人民进行全面的控制；三、把国民党县党部升格为和专员公署平行的党务督察员办事处，和部队政治部一起搞邮电、书刊检查，搞反革命宣传。别动队和国民党的督察员办事处还分别组织“复兴社”和“青年阵地社”，前者拉拢地方头面人物和中小学教师参加，后者诱骗中学生参加，形成对垒，国民党机构的增多，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就十分尖锐化和表面化了。国民党内部是矛盾的，但对革命的打击和破坏则是统一行动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省工委领导人林育被捕，随后壮烈牺牲。谢树中等在遵义组织临时县委，准备在埃山搞武装斗争。十一月，国民党贵州省中统根据打入革命组织的特务

密报，派出特务到遵义配合遵义的特务，逮捕了谢树中、周济、罗有余等，同时逮捕了一批教师和遵义师范等校的学生。国民党这次逮捕，引起全城群众公愤，开大会抗议，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冲击国民党党部。在会审法庭上又遭到群众斥责，别动队因国民党县党部争功，心存嫉妒，专员公署和别动队互相拉拢，释放了师生，将谢树中、周济、罗有余等八人转押贵阳后，又转押“委员长重庆行营”，分别被判处六至十年徒刑。一九三七年，县委书记杨天源和进步人士，被国民党伪造了一本《遵义共产党第六次会议记录》，逮捕审讯后，又转押贵阳。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下，几位共产党员才于一九三八年先后从重庆、贵阳出狱，罗有余病死狱中。

国民党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之后，招致了广大群众的抗议，人民群众还做了一些保护革命者的活动和营救的工作。如《续遵义府志》总纂赵乃康，贵阳的进步教师田君亮（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等都认为被捕的青年是爱国之士，出于一片爱国热情而有所活动，不应遭到逮捕。因此，他们敢于出面营救和保释出狱。

从监狱出来的和以嫌疑释放的大批革命志士，像受过入伍锻炼过的战士一样，更精神抖擞地、也更成熟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坚持救亡活动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的通讯机关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

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此形成，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时，遵义的国民党党部发起组织“遵义各界抗敌后援会”，同时组织“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意图控制前者来领导后者，利用后者笼络各界青年。参加“青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表示接受领导，但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青抗”在遵义开展演剧、歌咏活动，发动献金，慰劳军属，大造全民抗战的声势，办起了一张《活路》壁报和五张《游击队》壁报，宣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日必胜的道理，顽固派则办一张《扫荡》壁报来攻击“青抗”为共党张目，这一边在演《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戏剧；那一边则假造入场券散发，破坏剧场秩序。顽固派的丑恶表演反倒激起群众的公愤，更清楚的认识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更加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许多学生还写信到延安和抗日前线去慰问。

一九三九年一月，遵义地下党和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措施，就在各种宣传活动中大书大讲毛泽东同志的敌进我退，敌我相持，敌退我进三阶段论断；深入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还根据毛主席讲的抗战要打到鸭绿江边的决策，在《青年抗日救国会会歌》上写明“战斗，战斗，冲锋向前，冲到鸭绿江边。”这个歌子唱得愈响亮，顽固派愈感到难堪。人民每天涌到《活路》面前学习政治时事，而对于《扫荡》则又嗤之以鼻。顽固派恼羞成怒，企图由“各界抗敌后援会”出面，以“青抗”为共党张目为理由，逮捕几个青年，摧毁组织。顽固派的提案遭到出

席会议的爱国开明人士的反对；国民党内部有见识的官员也表示缄默。提案被否决，他们却撕破画皮，强行宣布解散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青年抗日救国会。”

和“青抗”同时宣传抗战的还有一个“快读书店”，它是一九三九年由地下党发起，经省工委领导批准，联络一些党的群众和开明人士创办的。书店经销延安、重庆、桂林和莫斯科出版的书籍，《新华日报》销售的数量超过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发行总和。国民党陆军大学、军官外语班和浙江大学都已迁到遵义，人口骤增至十万元以上，书店的读者有不少上述单位的军人和师生，顽固派红了眼，派宪兵三次查抄，但是书店还坚持开业一年多时间才被迫歇业。另有两个共产党员坚持开了一间专销《新华日报》的文具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书店虽然关门，而《新华日报》还公开或秘密地在发行。“青抗”虽然被解散，它的会员又转到民众教育馆办的“民众话剧社”去照样的活动。同时又以研究音乐教育为宗旨，组织教师队伍，请县政府一位开明的督学作发起人，到国民党党部办了立案手续，成立“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简称“音教会”）。“音教会”是“青抗”的延续和发展，把《陕北公学校歌》改名为《毕业上前线》，把《红军军歌》改名为《炮火连天响》，革命歌声，由城镇传遍农村几百所中小学中去。

遵义地下党还占有一所以“模范全县”小学的杨柳街文化小学，以这所学校为阵地，团结进步教师宣传抗战，还组织“农村抗日宣传队”到农村去演剧唱歌，用壁报的形式，写了《新华日报》上许多有关抗战的名句，鼓舞广大人民坚

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按照党指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迅速疏散到湖南去。地方的活动由一些隐蔽的党员和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由于国际法西斯的猖獗，国民党顽固派也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延安的声音，八路军的声音，解放区的声音，有时几乎隔绝了。为了传播革命的消息，保持群众的抗日热情，使群众对国家前途有希望，就办了一个和《活路》形式一样的《壁报》，从字里行间透露一些新鲜消息，正当这样艰难地坚持搏斗的时刻，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国民党逮捕了文化小学的六位教师，其中四位是共产党员。因为有一个共产党员越狱逃跑，国民党中统省调查室派到遵义审讯的特务要求专员高文伯枪毙这五个在押的“共产党员”。高文伯曾留学英、德，在北大作过教员，他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官，不敢表示同意。据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记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日，五点至专员公署……高文伯谓：遵义监禁共党嫌疑犯若干，多小学教师，为富家子弟，为主义所诱惑云云，可知其魔力之不小矣。”由此可见作为专员的高文伯并没有了解被捕人的政治情况，把他们看作是嫌疑分子，遵义地下党根据遵义的特殊情况：一般是单线联系，避免支部组织联系。但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叛徒的口供，似是而非地认定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就转押他们到贵阳去。逮捕案发生后，文化小学的进步教师都被解聘。

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在疏散时，把今后的联系和活动，委托和部署告诉给一些可靠的群众，并断言几年后国内局势

将有巨大变化，希望坚持下去。因此，在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书店和学校都被摧毁以后，群众仍然运用上层亲友关系，创办一间私立杰生小学，继续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

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支援了地方的革命活动

国民党把遵义看作是西南交通的枢纽，陪都重庆的屏障，国民党的各号头目如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红衣主教于斌等都到遵义视察和讲演过。国民党在遵义所设立的专门或兼办对付“异党活动”的机构有：特种汇报会议、警备司令部、五区保安司令部、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宪兵营、警察局、师管区司令部、宪兵特高组、军警联合会稽查处、西南公路特别党部调查室、缉私队、陆大、步校、外语班的政治部（政工组），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是中统黔北督导区和军统遵义站。它们在各机关、学校、团体、街道都布置有暗探、点子，专门搞情报密。遵义的革命力量和进步势力完全处在反革命势力的层层包围中。但是，革命的、进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隐蔽得深的共产党员照常在活动。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浙江大学在遵义的民主活动，他们的多次活动，使国民党为之张皇失措。因为有浙江大学这样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搞民主活动，就吸引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大部份人的注意力，地方力量才有休整的机会。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浙江大学学生愤怒地谴责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因为他的老婆宋霭龄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不把飞机抢救著名的文化人，却将他家的洋狗和马桶装运回重庆。示威游行队伍上街，大呼反对孔祥熙的口号，也就是反对蒋、宋、孔、陈四

大家族，还用粉笔写了“要穿便宜衣，打倒孔祥熙”等标语。竺可桢为保护学生，带队游行，群众倚立街头观看，深受感动。事后，有的学生被捕，蒋介石还下一道“随时处置一切之准备”电报。据《竺可桢日记》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记：“午后二时，张叔达（步兵学校教育长兼遵义警备司令）将蒋委员长关于学校纪律须严加整饬电，召集会议，到会的有高专员、县党部胡书记长、孔县长、遵师杨校长、县中曹校长、豫中汪校长、玉中喻校长，宪兵马营长、政治部宋主任（步校政治部宋文彬）等。余以足疾，请振公（即浙大秘书长诸葛振公）出席。张卓以俭电印刷分送云”。俭电的内容是：

“特急，步兵学校张教育长，叙密，浙大学风不良，内部分子复杂，最近竟在遵义游行示威，并在湄潭南岸张贴标语，诬蔑中央，破坏抗战，此种越轨行动，必为反动分子所主使。以后该校学生之行动，应由步校政治部负责秘密监察，并设法时与该校当局切实联系互助，对于校军训教官，亦应在平时由步校每月定期召集汇报、研究与切实指导，如该地附近学生再有游行及不轨行动或发生风潮，须与地方政府协力，并用军事管理学生。有随时处置一切之准备，以安全后方之秩序为要。浙校近情如何？希即查复。中正”。

这封特急电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从上到下对于学生的民主运动表现的那种杀气腾腾的面目：其一，国务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干预一个大学的学生运动，表现了惊惶畏惧的情态；二、自己消极抗日，反诬学生破坏抗战，这是蒋介石一贯说假话欺骗人民的又一次表演；三，不止是恐惧大学的学生运动，也恐惧“附近各校学生再

有游行及不轨行动或发生风潮”；四、把秘密监察与定期召集汇报的工作交由高级别的步兵学校负责办理。竺可桢提到“步校政治部宋文彬贪污犯法，亏负至三四万元之巨，无法委脱，故借告发浙大行之事以见功”，这也就是蒋介石要把破坏学生运动的任务交给步校的主要原因。遵义地方的革命活动如果没有浙大这个强大的民主堡垒，没有像竺可桢和其它一些著名教授对民主运动的爱护和支持，遭受的迫害还将厉害得多。

经过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遵义的革命活动虽然处于低潮，但仍然有地下党员存在，仍然又逐渐有一些进步力量团聚起来，在学校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教育，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在青年中，浙江大学的一些学术活动和文艺活动以及和地方青年联合的文艺活动，都为宣传抗日救亡，保存革命力量，作了一定的贡献。还要提一件事，国民党顽固派对革命力量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斗争，认为取得“胜利”的时候，又要转向内部的矛盾冲突。一九四三年初，遵义中统特务机关伸手向县政府分肥，对方不肯，就乘蒋介石到贵阳来的机会，诬控遵义县政府三个科长和县长都是共产党人，三个科长被捕，县长被调职审查。这是一出滑稽丑剧，是国民党丑恶的又一次大表演。还当看作它是遵义革命低潮时矛盾的转移。是研究这段历史可供理解时代背景的参考。

荣高棠同志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协作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提到南方局的工作，“不论是前一段，还是后一段都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大后方的群众运动由高潮到低潮，又由低潮到